



第一章 绪论

身份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研究议程的核心：对外政策依赖于对身份的表象。同时，也是通过对外政策的形成使身份得以产生并不断被重新建构。后结构主义理论把对外政策理解为一个话语过程，认为对外政策话语表达物质因素，并与物质因素以及观念相互交织在一起，二者无法相互区别开来。后结构主义理论也认为政策话语本身是社会性的，因为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政治对立问题以及更广泛的公共问题，把对身份以及存在风险的政策选择的理解制度化。

这种视角把后结构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把观念作为对外政策分析中的一个变量区别开来，认为身份并不是国家或其他集体独立于在展现和执行对外政策时所动员的独立话语实践（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Laffey and Weldes 1997；Katzenstein 1996）。因此，身份不可能被定义为一个变量，与对外政策随意分开，或是把它与其他非话语性的物质因素相互比较来衡量其解释价值。后结构主义以及话语分析的批评者们经常把这种因果认识论方面的缺失作为理论、方法论以及政治无政府性的途径。但是，本书将表明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能够产生一种在理论上富有活力和生机的研究议程，能够分析相关的政治问题。它也是一个可以针对对外政策传统问题的研究议程，如国家如何应对所面对的问题？政治家们如何为他们的行动寻求支持？同时，它也是理解媒体以及政治反对派如何展开政治辩论的重要性桥梁。

如果没有理论的话，那就只能描述；如果没有方法论，就不能把理论

- 转化为分析。后结构主义传统上并没有进行明确的方法论的讨论，因此我们必须解决后结构主义理论所面对的方法论方面的挑战。很多国际关系后结构主义理论学者吸收德里达的观点，而德里达则认为方法论是与科学的实证主义形式密切联系，他自己主张的解构是不讲究方法的，这些学者们还经常吸收文学、哲学和社会学的一些传统，它们通常不像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那样强调根据性和可靠性。但是，如果方法论与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联系是松散的，方法论被视为是理论变为分析的步骤和选择，那么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不但是可能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很多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所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的学术研究都需要面对的：什么应该成为分析的核心？一个研究设计如何围绕它而展开？如何来选择材料和数据，使其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更加可靠？后结构主义把书面或是口头表达的话语作为核心就要求人们对阅读方法（在对外政策的文本中身份如何辨别，针对相对立的话语如何进行研究）以及文本选择的方法（应该选择哪些形式和哪些类型的文本）给予特殊的关注。

本章的目标是把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置于国际关系领域之中，来更详细讨论理性主义对“现实世界的研究问题”和对因果认识论的要求。第一部分把后结构主义对身份的关注与国际关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追溯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第二部分认为后结构主义可以通过把身份作为一种话语的、政治的、关系的以及社会产物的概念理论化来直接面对“现实世界”的对外政策问题。第三部分通过把由媒体、反对派、评论家以及流行文化挑战或重塑的官方对外政策话语理论化来继续讨论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本章的第四部分重新回到对因果理论化的要求，该理论是通过政治学最全面的对定性因果研究设计的介绍来阐述，即由金（King）、基欧汉（Keohane）和维尔巴（Verba）1994年所著的《设计社会研究：定性分析中的科学推理》。人们一般认为后结构主义无法形成一个因果理论，因为身份与政策之间的关系相互建构，是具有行事性的。随之产生的对方法论的要求将在第五部分进行讨论，该部分同时也会呈现出本书第二部分的案例研究，即西方关于波斯尼亚战争辩论的研究方法。最后会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结构以及各章的内容。

后结构主义与国际关系领域

关于身份的问题在过去15年里一直处于国际关系学科辩论的中心,可能甚至是从国际关系开始之初就是这样。难道国际关系抽象的本质不是可以被最好地视为一个持续的关于国家身份(本体)、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差别以及改变国际关系范围的政治和规范辩论吗?这些问题,虽然没有用这些术语准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它们是国际关系一些经典著作的重要内容,如卡尔(E. H. Carr)、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诺曼·安格尔(Norman Angel)、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约翰·赫茨(John Herz)、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以及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作品。这些内容被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不断发展的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而掩盖了。 3

20世纪70年代末,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十分推崇实证主义和因果认识论,并把它们与抽象、超越历史的结构主义结合在一起。但是,当《国际政治理论》成为随后十年的主要著作时,它也为人们去发掘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和一种政治实践哲学和政治根基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非常赞赏约翰·赫茨的古典现实主义,并且创造了“新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它被批判贬低历史,颂扬结构决定论(Ashley 1981, 1984, 1987);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追溯了国家主权对国际关系学科而言的本体和政治重要性(Walker 1987, 1993)。弗里德里希·克劳托奇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尼古拉斯·奥努夫(Nicholas Onuf)和约翰·鲁杰(John Ruggie)指出了规范、机制和法律推理的重要性(Kratochwil 1989; Onuf 1989; Ruggie 1992; Kratochwil and Ruggie 1986)。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把结构-施动性的辩论带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华尔兹的结构主义是矛盾性地依赖于对于一个个体国家的特殊建构(Wendt 1987);詹姆斯·德尔·德里安(James Der Derian)表明外交并不是简单地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惯例,而是一种文化实践,通过这种实践,外国以及陌生的被不断调节(Der Derian 1987);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 J. Shapiro)认为对外政策并不是发生在抽象的脱离现实的新现实主义空间内,而是通过动员特殊的文化、种族以及政治身份而进行的(Shapiro 1988)。

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 在1988年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讲后, 这个群体开始被称为“反思主义”(reflectivist), 同时也获得了合法性。基欧汉认为“反思主义”为国际政治中制度的重要性提供了深刻认识, 这种认识并没有得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充分认可, 他把这两种视角一起称为“理性主义”(Keohane 1988)。但是, 非常重要的是反思主义采取了一种使其有能力进行理性主义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Keohane 1988: 389-393; 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nsner 1998: 677; Walt 1991)。基欧汉承认反思主义在指明身份、文化、规范、规制以及观念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确的, 但是认为它们需要形成一种因果假设, 使其能够经受更加严格的评价其应用性的检验。^① 这种理性-反思主义研究议程的建构对于自然科学和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模式更加关注, 而对于依赖于哲学、历史学以及重视理解的人文传统方面的知识形式则不然。

反思主义这一内部混乱的群体很快开始沿着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而分开, 到20世纪90年代末, 建构主义又继续分为“传统”或是“弱”(thin) 建构主义和“批判”或是“强”建构主义 (Katzenstein 1996; Adler 1997; Price and Reus-Smit 1998; Wendt 1999, Zehfuss 2001)。但是, 我们不能过于高估基欧汉这种区分的影响: 这种区分成功地把认识论置于本体论之上, 从认识论方面看需要讨论非物质性因素的重要性, 而在认识论方面的差别继续成为反思主义阵营内建构不同观点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亚历山大·温特在其久违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所说的: “当涉及到社会研究的认识论时, 我是一个坚定的科学信仰者——虽然一定存在多元的科学, 在这之中‘理解’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 科学也是同样的。我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Wendt 1999: 39)

建构主义一直愿意接受一个学科标签, 或许这甚至被认为是建构主义的一个策略性优势, 但在过去这些年中, 很少有研究说自己是后现代或是后结构主义者。当这样做时, 人们经常是选择后结构主义, 认为“后结构主义”指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不是反结构主义)、哲学、社会理论以及文学理论 (更具体是指向尼采、克里斯蒂娃、福柯、德里达等作者) 的理论根基, 而“后现代”主要指一种特定的历史秩序 (Hansen

^① 在女权主义研究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基欧汉支持理性主义研究议程的观点 (Keohane 1989, 1998; Tickner 1997, 1998; Weber 1994)。

1997; Wæver 2002)。这种自我认可的缺失表明把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连贯的视角来呈现,大部分是由其批判者来进行的(例外的情况,参见 Der Derian and Shapiro 1989; Ashley and Walker 1990; George 1994)。理性主义批判“后现代”是在迷惑国际关系研究(Walt 1991),后现代“自我参照,脱离世界”,否定“使用证据来判断所说的真理”(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1998: 678)。但是,尽管存在这些不足,在《国际组织》50周年对国际关系的调查中,卡赞斯坦(Katzenstein)、基欧汉和克拉斯纳(Krasner)警告说“非常容易低估这股学术思潮的直接重要性和间接影响”。后现代在美国和欧洲更广义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很多支持者,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主要刊物和丛书也都致力于出版和发表后现代的研究成果(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1998: 678)。到20世纪中期,建构主义开始表示他们与“一些外来的(猜想是巴黎的)社会理论”分开(Jepperson et al. 1936: 34; 也可参见 Adler 1997, Wendt 1999; Wæver 1998; Price and Reut-Smit 1998)。^①即使理查德·普里斯(Richard Price)和克里斯蒂安·列乌特-斯密特(Christian Reut-Smit)说自己是探索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领域,也批判后现代主义,认为后现代主义“忽视了理论阐释和经验分析”,没能解释或预测冷战的结束,也不能解释一种话语的形成胜出其他话语的原因(Price and Reut-Smit 1998: 264-265, 279)^②。因此,建构主义称要通过使20世纪80年代后结构主义的最佳内容与理性主义的认识论相结合来修正这些不足也就不足为奇了(Price and Reut-Smit 1998: 283-284)。

对于不同的思想学派和学术视角使用不同的标签对于学科辩论的开展 5
十分重要(Wæver 1998)。标签对于读者来说起到了代码作用,而对于理论建设和研究项目则起到了汇合点的作用。后结构主义缺乏一个清晰的纲领,这使非后结构主义的人们很难去评价这些评判(对于一些反应,参见 Walker 1993: 81-86; Der Derian 1992: 8-11; Campbell 1998b: 207-227)。实际上,从本书可以看到,人们对后结构主义的很多评价是起误导作用

^①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温特在他1992年的文章中(Wendt 1992: 934)指出了阿什利与沃克的研究对他的影响。

^② 人们认为考克斯、德里安、蒂克纳(Tickner)以及坎贝尔的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作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但是“第三次论战的很多先锋似乎是安于重申他们对国际关系长期所坚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批判”(Price and Reus-Smit 1998: 285)。

的。^①或者我们表达得更具建构性一点：通过利用国际关系之内和国际关系之外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成果，但是与理性主义与传统的建构主义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发展一个关于身份和对外政策的理论是可能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如同其他所有理论一样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实际上没有哪个理论可以同时解决所有研究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后结构主义理论不但来表明身份对对外政策十分重要，而且表明可以通过采用话语理论对它们进行系统研究。这么做主要可以围绕以身份的表象对对外政策的形成和辩论的建构性意义为核心进行一系列研究，认为采用一种非因果的认识论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理论框架、“现实世界的相关性”的经验分析或是对数据和方法论的系统评价。

作为“现实世界”表象的研究问题

人们如何来决定一个研究项目的研究范围呢？在金、基欧汉和维尔巴（1994）的权威著作《设计社会研究》中，他们指出没有什么规则可以决定是研究民族冲突还是教育政策，是研究北约还是研究欧盟，是研究贫困还是研究战争。人们可以确立的唯一标准是“提出对现实世界来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应该会影响政治、社会或是经济生活；或是对人们理解影响很多人生活的事物产生影响；或是对于理解和预测可能是有害或是有益的事件产生影响”（King et. al. 1994: 15，强调和引用是原文标出的）。这就表明人们的研究内容可以非常宽泛，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人说自己不与“现实世界的内容”相一致。当人们批判后结构主义脱离了对现实世界的研究时，其危险因此在于更具体的争论，即研究有意义的事件和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后结构主义关注哲学和文本，偏离了对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认识和所做的对“现实对外政策”的

^① 对后结构主义的表象是有误导性的，对于批判建构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限也是如此。一边是受德里达、福柯、拉克洛、穆夫（Campbell 1992, 1993, 1998; Neumann 1996a, 1999; Wæver 2002; Hansen and Wæver 2002）影响的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另一边是受维特格斯坦语言游戏的影响，就如菲尔克（Karin Fierke）（1996, 1998, 1999）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样，还有像珍妮弗·米利肯（Jennifer Milliken: 2001）或贾妮思·马特恩（Janice Bially Mattern: 2001）所采用的结构语言学或是叙事视角，它们之间存在差异，但是理性建构主义或是传统建构主义并没有把这些差异表达出来。

关注。

但是,即使是针对狭义的“现实世界相关性”的定义,后结构主义分析具有一个与对外政策的实施直接相关的研究方案。这个研究方案是基于以下假定,即政策依赖于政策要解决的威胁、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危机的表象。对外政策需要赋予环境和场景以意义,并且在这种环境中来建构事物。这样做时需要使用其他国家、地区、人民和制度的身份,同时也要利用国家、地区和制度的“自我”身份。例如,克林顿政府经常把波斯尼亚战争表述为“巴尔干战争”。按照这种表象,该战争就是在一些具有“巴尔干身份”的野蛮和暴力的人之间进行的战争,他们相互间的憎恨至少持续了500年。这就反过来使该战争成为如同时任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所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来自地域的问题”,西方没有解决该问题的手段(Friedman 1993)。作为一个结果,西方的干预就只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应该尽量避免,除非它影响到西方的安全。

后结构主义关于对外政策依赖于身份表象的假定与对身份的认同相关,即身份是话语的、政治的、关系的和社会的。我们说身份是话语的和政治的是认为身份的表象是把对外政策置于一个特殊的理解的视域下,在这个视域下,其结果是对外政策的形成是对对外政策的表象所做的相对应的反应。把身份理论化为通过话语建构,政策依赖于身份的话语建构,是认为不存在话语领域之外的客观身份,因此身份不可能作为一个变量,被用来衡量行为和非话语因素。这也表明身份概念化的前提是只有现在的身份不断被表述,而且没有来自竞争话语的竞争(Anderson 1983)。后结构主义强调身份的政治内容,把它与人类学关于结婚仪式或是对文化艺术品的美学分析,如建筑、音乐、文学等中作为“文化”的身份概念化区别开来。^①冲突也无法通过“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解释。后结构主义关于身份是关系的观点表明身份总是通过与它不是的内容的对比而产生。谈及“美国”、“欧洲”、“野蛮人”或是“不发达的”总是在建构一种非美国的、非欧洲的、文明的或是发达的身份。把身份理论化为社会的是要通过一系列集体表达的编码(codes),而不是把它作为个人的一种私有财产或是心理

^① 这并不是说这些实践和手工艺品不能被赋予政治意义,就如人们围绕纽约所建的“9·11”纪念碑的设计而展开的辩论一样。

条件：并不是说个人不理解拥有身份的自己，而是个人身份是在一个集体的范围内，通过集体建构而来。

- 把身份概念化为话语的、政治的、关系的和社会的表明对外政策话语总是表达“自我”（Self）和系列的“他者”（Other）。身份话语传统上来说都是建构一个本国的“自我”和一个或多个威胁的“他者”，这些“他者”身份与“自我”身份完全不同。但是，身份的建构并不一定总是通过把完全不同的和威胁的“他者”放在一起建构（Campbell 1992）。身份的建构可以通过表达他者不同程度的差异，可以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基本区别，也可以是不那么激进的差异建构。“他者”的表述可以通过地理的表象，也可以通过诸如“文明”、“国家”、“部落”、“恐怖分子”、“女人”、“平民”、“人类”等政治表象来构建。身份的地理和政治建构通常是对某个主题的重复、进步、变化、落后、发展等的表述，以一个特殊的时间性身份表象出来。时间性的表象通常是把当前的对外政策问题置于一个历史的话语中，但是它们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看完全是话语：是意义的框定和理解的范围，而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对外政策分析的范围：官方话语的位置

如果身份的表象总是被用以使对外政策合法化的话，那么这些表象到底从何而来？官方的表象如何与那些反对党和反对群体、媒体、知识分子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认为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是处于一个更大的政治和公共范围内，他们的表象作为一种结果是利用大量的个人、机构和媒体等的表象而形成的。高层的政治家们对于他们面前的问题很少有详细的了解，因此主要是依赖其顾问、媒体报道，有些时候是依赖于一些背景材料来框定对所要采取的政策的表现。当“再谈到”他们对对外政策的表象时，政治家们反过来又会影响在一个特定的对外政策问题上被认为是恰当的表现。这并不是说对外政策话语与其他来源的表现一定是完全一致的：政治家们并不总是（甚至很少）重塑媒体和专家的表现，官方话语也决定不了其他渠道或是其他人的表现，至少在民主社会是这样。但是，政治家们在表达对外政策时，当努力向选民表示其政策的合法性时，不考虑更大的公共范围内的相关表现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实际的。

把官方的对外政策话语置于一个更宽的话语领域来理解开启了一个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议程,来研究对外政策的表象与反对派、媒体、学界与通俗文化的表象如何相互加强和相互竞争(Hansen and Wæver 2002; Holm 1993, 1997; Shapiro 1988, 1997; Der Derian 1992; Hansen 1996; Neumann 1996a)。一些对外政策的问题与其他问题相比可能没有那么多争议,这样从表象的角度看就没有那么多样。因此,人们就更可能把分析的重心放在官方的政策和话语之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包含更大范围的行为体和媒体也不会有太多新的内容。^①但是,这种霸权情况可以被视为对非政府来源的话语的一个有价值的扩展研究,这可以体现出政府的表象是如何被传播和再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积累。^②通过研究对外政策在官方话语、反对党、媒体以及书面的流行形式中的再现形式与竞争来研究对外政策也会表明体裁(genre)的重要性。官方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努力把自己建构为阐述对外政策问题的权威:他们正式的权威性是来自相关的制度和机构,但是权威同时也是建立对于一个特定问题的了解。因此,知识成为建立权威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反过来又为对外政策的话语分析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因为不同的体裁,例如政策性演讲、记者报道、学术分析,可以建构被接受知识的内容和形式。文本如何建构了知识成为一个需要分析的经验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决定是否如同在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辩论中所体现的恰当的社会科学认识论问题。对外政策不同的书面体裁采用了不同形式的知识,在我们认为对外政策的话语之间存在互文性联系时变得尤为突出。对对外政策的互文性理解认为文本通过参考其他文本来树立其自身的观点和权威性:或是通过引用或是采纳

8

^① 这种评价要求精心挑选初步研究或是更宽泛记载官方话语霸权地位的次要文献(secondary literature)。

^② 官方话语的地位应该如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讨论的,要求表明这种话语如何利用具有特殊概念和政治历史的表象。后结构主义的官方话语分析,正如在坎贝尔的《书写安全》中所显示的,经常表明官方话语的表达经常是与一些不被认为是对外政策的领域一起,如吸毒、同性恋等(Campbell 1992)。

一些主要的概念和标语。^① 通过与原有文本的联系，新的文本依赖于旧的文本的地位，但是这个阅读和关联的过程同时也产生新的意义：参考永远不会再现完全等同的意义，而是把它们融入新的语境与观点之中。

9 对外政策决策者们通过参考媒体报道以及学术分析来支持他们的话语，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也会经常引用一些通常被认为是不科学或是明显不属于政治领域的文本。西方关于波斯尼亚战争的辩论表明，各类不同的文本和体裁不仅对宽泛的辩论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影响了那些重要的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克林顿在阅读了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Kaplan 1993a；Drew 1994）的游记《巴尔干幽灵》（Balkan Ghost）之后，放弃了万斯—欧文（Vance-Owen）和平计划和“取消禁运和空袭”政策：即解除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武器禁运和轰炸波黑塞族的观点。而卡普兰的主要写作依据是另外一部游记，即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在二战前所著的《黑色羔羊与灰色猎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人们认为该书影响了两代读者、政策决策者以及外交官们支持塞尔维亚人的态度（Holbrooke 1998：22；Simms 2001：179）。这些刚开始我们可能会认为是一些特殊的例子，但是在第四章中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不仅仅是游记，一些备忘录等从探索到形成当代外交辩论的过程中对西方国际政治的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备忘录和游记被认为是一种“非虚构文学”（literary non-fiction）体裁，它们主要使用知识的事实性学术形式，尤其是在表达一些史学观点时，但同时也依赖知识的主观形式以及文学技巧和主题。^②

① 理性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只关注文本似乎是基于以下（隐含的）观点：后结构主义致力于研究深奥或是奇特的内容——侦探小说、运动与战争和电影之间的联系——这些对“真正的对外政策决策并没有影响”（参见 Der Derian and Shapiro 1989 和 Ashley and Walker 1990 早期对互文性研究的例子）。第四章对这种批评进行了回应，把对通俗文化的研究置于与官方对外政策话语的物质联系内来考虑。

② 流行文化、电影、电视、计算机游戏以及喜剧与对外政策的辩论也存在很强的相关性（Der Derian 1992；Shapiro 1997；Wæver 2001；Weldes 2003）。但是，尽管我的研究框架可以把它们包含进来，但是我并不想努力发展一个通俗文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的完整理论，因为至少这需要全面思考视觉与互动认识论。

认识论挑战

决定研究范围和研究问题是确立一个研究议程的核心，但是界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应该如何提出就与认识论问题联系在一起。金、基欧汉和维尔巴认为研究主题除了要与“现实世界”相联系之外，应该“通过提升我们建构为世界某方面可以证实的科学解释的集体能力，对已明确的学术研究文献做出特定贡献”，因此认为因果认识研究优于那些使用和需要知识的其他形式的研究（King et al. 1994: 15；原文的强调）。

关于什么构成了因果认识论的概念以及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如何完全按照因果认识论来进行研究辩论广泛，且包罗万象。理性主义，如金、基欧汉和维尔巴所全面阐述的那样，认为社会科学理论应该产生关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可证伪假设。这就给那些用于启发的“描述”和建构理论的数据留下了空间，但是描述“除非与一些因果关系有关联，否则人们就会对其失去大部分的兴趣”（King et al. 1994: 34）。在存在“多种因果”的情况下，即同样的结果可以是由不同自变量的结合而导致的，明确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人们并不会因此放弃因果性，而是要界定“准确产生构成每个因果效果的反事实条件”（King et al. 1994: 87, 89）。简言之，在理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中，没有不用因果认识论而被理论化的研究范围。

建构主义对此的反应认为描述与因果理论之间的区分会起误导作用：对外政策的构成性理论可能不会做出一些因果论断，但是把结构与施动者之间以及身份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建构关系理论化使建构主义成为一种理论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描述（Wendt 1999: 87）。而且，从知识的社会学角度看，“纯的描述”所描述的对象是否存在令人怀疑，如何描述取决于针对某个现象特殊方面的选择。我们还应该区分对收集“原数据”（raw data）或是数字的描述，例如，武器的水平以及关注系列现象间关系的描述性理论。但是，传统建构主义接受把非因果理论作为其研究议程的一部分，使其研究议程包含了更多关于认识论方面的研究理想（Katzenstein 1996）。他们还使用了因果概念来评价理论的有效性。用温特的话来说，构建理论“表明可以验证也应该验证的世界的假设”（Wendt 1999: 87）。普利斯（Price）与列乌特-斯密特（Reut-Smit）认为建构主义应该“回答

- 10 那些传统学者一定会问的较难解答和好的问题——向我们表明你们的话语重要，表明有多重要”，衡量因果性和变化性对考量话语与身份的重要性是必需的（Price and Reut-Smit 1998: 279, 282; Wendt 1999: 55-56; Wight 1999; Campbell 1999）。^①

金、基欧汉和维尔巴强调进行好的因果研究设计经常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但是应该注意因果概念本身的定义是非常严密和狭窄的，因为社会生活与可控的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所能允许的内容相比，会涉及更多方面，影响模式也是相互交织。^②但是，一些因果性更加模糊的概念也是常见的，如身份与话语对政策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和产生的“后果”，还有那些来自于日常使用的“因果”概念。但是，如果从金、基欧汉和维尔的严谨概念转向日常较模糊的概念的话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这会使因果概念太宽泛，以致于几乎失去了意义：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被认为不是因果关系的，人类以及人类所运行的制度，他们的行动几乎都被描述为是由原因驱使。也就是说，行为体使用“话语的因果性”来解释他们的行动，但是它们从认识论角度只是一种单一的观察，而不属于具有因果关联范畴的现象。

但是，这并不是说关于因果概念不存在概念争议，任何时候人们都会遵从这个概念，也不是说在理性主义概念和日常使用概念之间不存在重要的概念性问题。因果关系概念有其自己的历史，金、基欧汉和维尔所提出的休谟式的经验论并不是人们所揭示的唯一的一种（Kurki，即将出版）。即便如此，这个概念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它成为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学术研究不得不把自己置于之中的模式。

与传统建构主义所接受的因果认识论相比，对后结构主义来说，什么构成“恰当的知识”不是体现一个理论揭示因果真理的能力，因为知识总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之下产生。因果认识论因此是知识的一种特殊话语，在它所处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之外就无法维持其作为知识的特权

^① 普利斯（Price）和列乌特-斯密特（Reus-Smit）对此进行了修正，增加了“我们并不建议所有的研究都必须都要考虑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指出了德里安、戴维·坎贝尔以及巴拉德利·克莱因（Bradley Klein）等人没有评价因果性的研究缺陷，削弱了这种观点。

^② 但是，因果理论是否总是与该定义符合并不是很明确。举个明显的例子：温特强调他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阐述的建构主义是实证主义，但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提出的无政府状态的三种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以及这三种文化的内化程度，即强迫、自我利益与合法性，可以证伪（Wendt 1999）。

(Foucault 1970: 1974)。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批判后结构主义不愿进行因果的理论研究。本书认为身份与对外政策的表象是通过话语联系在一起,但是二者之间并不是因果关系,因为身份的表象既是政策表述的前提条件,同时又通过政策的表述被重构。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与因果认识论的联系使其具有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活力,因此在学术方面也并不孤立,后结构主义与它们不同。本书的第一部分将形成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来研究身份与政策的互构过程或是在行为方面的相互影响过程,同时认为这个框架需要在历史和语境的基础之上来进行应用。

11

方法论与“案例加研究”的地位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呈现出一个全面的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框架,同时提出一个阅读方法和进行研究设计以及选取文本的方法。这些章节会不断地使用一些例子和图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转入对西方关于波斯尼亚战争的详细研究。该研究将利用第一部分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整个分析是一个案例研究,主要是展现第一部分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验证,因为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的基本观点是其建构性,而不是因果性。如果“案例研究”只是意味着把理论用于某个特殊现象,而没有继续进行理论阐释的话,第二部分关于波斯尼亚战争的研究也不仅仅是一个案例研究。它将被用作一个媒介,继续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第十章对将来的研究议程提出一系列建议。

选择西方关于波斯尼亚战争的辩论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表明理论框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示出理论的经验范围:关于波斯尼亚战争存在相互竞争的不同表象,同时也存在相互竞争的政策;对“他者”的建构有激进的,也有非激进的;表象和政策随着时间变化在演变;作为身份建构组成部分的历史上所孕育的概念的表述;有政治分歧,也有政治霸权;有媒体对对外政策话语的影响,也有非虚构文学作品对对外政策话语的影响;正是一个对外政策问题被建构的在政治方面如此重要而使它引起了西方大国和机构的反应。西方针对波斯尼亚战争的辩论并不是一个代表性案例,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外交辩论都是以同样模式展开。是否会达成一致而不是相互竞争?是否是完全不同还是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持续是否会继续还是会发生变化?是否媒体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不

是那么明确？这些都是理论应该探讨的。^①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宏大的研究而不是几个小的研究？答案是虽然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可以用于分析很多不同的内容，但是这种分析形式要求对研究的问题具有非常宽厚的知识，因此进行案例研究的数量不宜过多。

本书的内容

12 本书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第二部分是西方关于波斯尼亚战争辩论的话语分析。第一部分是从第二章“话语分析、身份和对外政策”开始，阐述了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的语言本体论和话语认识论。该章认为政策与身份都具有行事性，二者相互联系，不能以因果关系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关注在对外政策的辩论范围内身份与政策的结合，同时关注这些结合涵盖话语建构的“事实”和“事件”的能力。

第三章的标题是“他者之外：身份复杂性分析”。本章对身份的概念进行进一步讨论。通过利用戴维·坎贝尔（David Campbell）和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的研究，本章认为身份是关系的、话语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一个国家的“自我”身份通过不同程度的差异表述出来，从完全不同到相似，同时也建构了“他者”。“自我”与“他者”的建构可以通过两个同时发生的逻辑而理论化，即差异（differentiation）逻辑和关联（linking）逻辑。同时，该建构过程也通过空间、时间和道义内容把身份呈现出来。对外政策的辩论围绕大量的文本而展开，本章的最后部分认为这些可以被视为是由几个小的基本话语而产生的结构，表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完全不同的关系。

第四章的标题是“对外政策的互文性分析：体裁、权威和知识”。本章继续讨论如何勾画话语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引入互文性概念以展示文本如何相互利用来为身份和对外政策树立合法性和权威性。话语分析可以被用于多个对外政策行为体和多个领域中。本章提出了三种具有不同研究议程和分析目标的互文研究模式。一种模式以对外政策话语为核心，第二

^① 关注西方政策与辩论表明研究是“从外部讲述”而不是从“南斯拉夫解体内部来讲述”。把话语分析用于非西方的语境下将在针对理论与方法论的章节中来讨论。

种模式以更宽泛的反对党、媒体和公司组织为核心,第三种模式以通俗文化与边缘的政治话语为核心。以互文性视角来研究官方话语意味着要参考其他文本进行证明和分析,这样就把不同体裁的文本包含进来,如各类报道、学术研究、游记、自传等。所有文本和体裁都体现出作者的知识,但是知识的构成在政策演讲、调研报告以及游记中则不同。写作包含事实性的内容,也包含虚构的内容,尤其是回忆录和游记,它们对于对外政策辩论的重要性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但是,针对这些问题缺乏理论性研究,因此在本章的最后部分将进行详细讨论。

阅读方法论在第二章到第四章中都很重要。第五章的标题是“研究设计:提出问题与选择文本”,本章转向后结构主义研究设计问题。第一部分提出了一个研究设计模式,通过选择四个纬度进行具体研究:互文模式、“自我”的数量与类型、时间视角、事件的数量及类型。讨论的第二个方法

13

论问题涉及文本的选择。本章认为应该选择所选研究事件当时的材料以及可以追溯重要表象谱系的历史材料,应该包括那些具有明显的互文意义的主要文本和能够显示出主流话语的一般材料。本章的第二部分把研究设计的选择与文本的选择相结合,展示出本书第二部分所研究的案例,即西方关于波斯尼亚战争的辩论。

第二部分的第六章是“西方关于波斯尼亚战争辩论的基本话语”。本章认为“巴尔干人”是西方论战内的两个主要表象之一,分析它是何时以及如何被概念化的。历史谱系体现出三种话语:浪漫的、文明的和巴尔干化。这些都把“巴尔干人”表现得与西方不同。巴尔干化话语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两个话语形成的。一个是“巴尔干话语”,把在波斯尼亚的战争建构为古老巴尔干仇恨的产物,是西方不能也无法解决的冲突。与其对立的另一个基本话语是“种族灭绝话语”,对“巴尔干话语”这种表象提出了挑战,指出战争是塞族的政治与军事领导人所进行的种族屠杀,西方具有道德义务来拯救波斯尼亚。

第七章是“人道主义责任与‘解除禁运和空袭’:追溯跨大西洋政策话语”。本章在针对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的分析中主要利用了两个基本话语,看这些话语是受国会的反对党与媒体的支持还是挑战。本章指出了大西洋两岸非常重要的差异:英国保守政府通过把波斯尼亚领导人和无辜的平民区分开而建构了前者对后者的责任。该话语得到工党的支持,在面对波斯尼亚所发生的系列事件时也非常有适应力。与此不同的

是，美国话语是由两任总统而形成。当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初就职后，他的话不是很不稳定，基本是巴尔干话语和种族屠杀话语的结合，最后采纳的是巴尔干话语。尽管在1995年中期之前该话语一直不是很完整，但是一直受到来自美国参议院的挑战，美国参议院的种族屠杀话语认为西方对波斯尼亚政府具有责任，应该采取“解除禁运和空袭”政策。

第八章和第九章从面对波斯尼亚的系列实践和国内的批评，从政策话语层面以及它的时间性重构转向两种基本话语之间更详细联系的互文性研究和对主要文本的研究。第八章“记录过去，预测未来：旅游者、现实主义和文明政治”，主要研究通过两个主要文本所建立的巴尔干话语的互文性网络，这两个主要文本一个是卡普兰的《巴尔干幽灵》，该游记影响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春做出了放弃万斯—欧文（Vance-Owen）和平计划以及“解除禁运和空袭”的计划。另一个是韦斯特的《黑色羔羊与灰色猎鹰》，它是卡普兰作品的主要来源，该书完成于1941年，在辩论过程中被广泛引用。卡普兰和韦斯特的作品都被认为是关于巴尔干话语的代表，都被广泛阅读。但是，分析表明他们的作品突出使用了浪漫主义话语，对政策的影响也是有争议的。把这些作品置于一个更加宽泛的辩论之中，作为两个参考的互文性要点的概念凸显出来，即文明与古老仇恨。文明的概念首先要追溯到萨缪尔·P.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关于“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和书，同时还可以追溯到乔治·F. 凯南（George F. Kennan）为1993年再版的《国际委员会对巴尔干战争起因和行为的调查报告》（1914）。古老仇恨的概念是来自于新现实主义的作品以及对约翰·米尔海斯默（John Mearsheimer）和巴里·波森（Barry Posen）作品的批评。除了凯南之外，所有这些作者都表达出对巴尔干话语的一种改变，表明了各类具体政策建议都与“巴尔干人”的身份相联系。

第九章“西方的失败？种族灭绝话语的演变与不行动政策的道义标准”转向另一种基本的话语，即种族灭绝话语以及对西方政策的批评。本章第一部分主要思考该话语内的主要文本：罗伊·伽特曼（Roy Gutman）的报告，后来被收集在《种族灭绝的见证者》（A Witness to Genocide）中，揭示了1992年夏天在波斯尼亚的北部集中营发生的一切。本章的第二部分审视了该种族灭绝话语的三种变体：“种族灭绝话语的欧洲责任”、“巴尔干化塞族话语”以及在讨论种族灭绝话语与巴尔干话语之间话语稳定性和话语界限时的“性别种族灭绝话语”。值得注意的是坎贝尔在他的《民族解

构》中对西方的批评，这也是对西方辩论的后结构主义分析，既是对《作为实践的安全》的补充也是挑战。本章的第三部分把《民族解构》在该论战中作为一个文本来阅读，认为坎贝尔虽然批判种族灭绝话语，但是还是倾向于种族灭绝话语。种族灭绝话语对西方的批评性阅读最后与两个最重要的调停者戴维·欧文（David Owen）和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的回忆录并列在一起。

第十章结论部分总结了最重要的理论分析观点，通过讨论坎贝尔的《民族解构》解决了“什么构成了好的话语分析”这个问题，并且对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的进一步研究议程提出若干建议性研究问题。